政治科學論叢／第 81 期／民國 108 年 9 月／頁 105-148

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性：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個案分析*

李翠萍**

摘　要

本研究基於制度論的觀點，透過深度訪談、田野觀察與歷史文件資料分析，檢視被重工業污染的瀨戶內海小島，如何在企業財團倡導的公益資本主義之下，透過舉辦國際藝術祭而活化。研究結果顯示，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制度特質──政府與財團之間的結合關係，以及承襲半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權觀念，影響了政府、財團與常民的思維模式與行爲，再加上偏鄉的特質，使得強調以企業資本解決社會問題的公益資本主義，在應用於偏鄉振興時，自然而然出現了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途徑。財團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主導了振興獲利模式與在地文化詮釋，使島上呈現了明顯的階層差距。同時，偏鄉住民承擔著觀光帶來的外部成本，卻沒有獲得足以支撐島民經濟的實質獲益，因此無法抑制人口流失。本研究於結論嘗試提出三大原則，以減少公益資本主義在應用上的侷限。

關鍵詞：偏鄉振興政策、公益資本主義、環境治理、社區再生

---

* DOI:10.6166/TJPS.201909_(81).0004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所提供的修改建議，特別是審查人提醒應加強理論對話，與從文化觀點思考日本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不同，作者深覺受益匪淺。此外，亦感謝李恩玉與周孟蓁兩位助理的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最後，感謝科技部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194-049-MY2）提供經費補助。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tsueyping.lee@gmail.com。

收稿日期：108 年 4 月 8 日；通過日期：108 年 9 月 4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偏鄉振興是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重要課題，自 1989 年起，經濟部開始推動一鄉一特色計畫，試圖透過特色產業活絡地方經濟，而近年來各地設置的觀光設施，例如天空步道、水晶教堂等，更是試圖振興的軌跡。偏鄉振興的途徑多元，例如重建在地產業、土地再利用或是發展觀光等，有些振興模式是由在地居民或草根性團體發起，有些則是藉由外來產業進駐而活化。瀨戶內海被重工業污染的小島群透過現代藝術活化的案例，是亞洲地區著名的偏鄉振興個案，也是我國政府試圖學習仿效的範例，被譽爲「地方創生的成功實例」（交通部，2018：33）與「可作爲我國農村地區社區營造的學習模式參考」（文化部，2016：9）。

瀨戶內海小島群的振興模式，是日本倍樂生財團（ベネッセコーポレーション，前身爲福武財團）基於公益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而形成，相較於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公益資本主義主張更積極的利用企業資本來解決社會問題。然而，鑲嵌於日本式資本主義之中，再加上偏鄉獨有的特質，使公益資本主義的操作過程與結果無法符合公益的初衷，財團即使立意良善，但源於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再加上小島環境污染的歷史背景，以及人口外流、老化與經濟衰退的現狀，使島上出現了明顯的階層差距。現代藝術之島的美名，到底爲島民帶來什麼利益？爲什麼外界公認的偏鄉振興範例，卻呈現一種社會階層的疏離？爲什麼操作了 30 年的藝術文化振興策略，仍無法抑制小島人口流失？如果藝術祭是活絡地方經濟的良藥，爲什麼無法吸引人口移入？本研究將基於制度論的觀點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本研究之所以採制度論的觀點，檢視日本式資本主義特質如何限制公益資本主義理念的實踐，主要是因爲觀察到偏鄉振興的主事者（財團與地方政府），基於公益理念執行振興策略，卻讓島上出現不符初衷的現象，而非關道德判斷的制度論，可引領研究者從深植於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爲島上的振興現狀提出解釋。而用於歸納分析的資料，則是採自本研究的田野觀察筆記、在地深度訪談逐字稿、在地蒐集的文件資料與先行研究。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以下先說明本研究所採取之制度論的觀點，並探討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制度架構與特質，以及公益式資本主義的內涵，再說明研究方法與訪談對象。研究結果分爲三個部分敘明，分別是本研究個案直島、豐島與犬島的簡介、人口流動趨勢，以及從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特質梳理小島振興途徑的產生、實作、與振興結果中不符公益理念之處，並於結論中反思我國仿效此振興途徑的可能性與偏鄉振興原則。

貳、理論基礎

社會制度論者認爲，制度不僅僅是正式的規則或標準作業程序，還包括其中被視爲理所當然的觀點與共同規範，影響著個人的感覺與偏好，進而使其採取適當的、符合共同價值的行爲（Scharpf, 2000）。制度的形成與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制度的形式與過程，是透過儀式、習慣、迷思等具有文化底蘊的實務操作，而逐漸成型的（Meyer & Rowan, 1977），由於個人浸濡在制度中，也是傳承制度的載體，因而制度會透過習以爲常的認知腳本、規則、模型，影響個人的偏好與認同感，進而影響個人行爲（Hall & Taylor, 1996: 948；Scott, 1994: 56-63）。意即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把其在制度中的角色內化爲一種行爲規範，因此自然而然做出符合制度規範的行爲。所謂自然而然的行爲，意味著人們在服從規範或採取行動時，並非來自計算、特意的決定、或認爲這些行動是合理或應該的，而是對於其他選擇沒有任何感知的狀況下，理所當然的態度或行動。這是一種在行動者（actor）與行動（action）二者之間交相融合而成的行動者位格（actorhood），個人、組織甚至國家，在其所扮演的角色中幾乎不經思索地採取某種態度與行動，很難說是角色影響了行動，抑或行動影響了角色（Meyer, 2008）。在社會制度論的觀點之下，制度在指引個人的態度與行爲時，也引導個人對自己能做什麼的想像（Hall & Taylor, 1996: 949），也就是框住個人的思想界限。

社會制度論解釋了具有文化底蘊的制度系絡如何影響個人、組織、國家的態度與行爲。更進一步的，由於行動者在制度的影響之下，對於制度的反應都不自覺的呈現標準化的方式，因此，政策或制度就不斷地被學習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複製，即使各地的特質差異甚大，卻處處存在著類似的制度（Meyer, 2008）。然而，制度雖然被複製，但卻會因爲各種在地的特質而無法被徹底執行，而與實務脫離，例如，Hafner-Burton & Tsutsui (2005) 以跨國量化數據研究人權在全世界的制度化過程，發現各國政府紛紛簽署人權協約，甚至在國內通過了相關法令，但其國內相關的實務運作卻不見得跟進，甚有反其道而行的情形。Brunsson & Olsen (1993: Chapter 3) 的研究也發現，許多組織皆宣稱改革能幫助組織適應多變的大環境，所以改革成了普世價值，有趣的是，我們會看到很多組織提出改革方案，但能徹底執行者卻相當有限。

制度雖然可以透過改革來改變，但能夠被快速改變的只是法定的規則，至於融合於社會文化中的行事習慣、觀點與不成文規範，並不容易快速改變，Roland (2004) 把制度分爲快速變遷（fast-moving）與慢速變遷（slow-moving）兩種。快速變遷的制度指涉可以透過立法改變的法規，這並非暗指制度會常常改變，而是指正式的制度往往能夠經由政治程序而在短期內就能建立。至於被歸類爲慢速變遷的制度，則是指涉文化，即社會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共同價值、信念與社會規範，改變它需要很長的時間。快速與慢速變遷兩種制度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釋何以制度的移植不容易成功，因爲不同的地方特質是源於慢速變遷的地方文化，所以快速複製一個與在地價值格格不入的制度時，將導致制度表象的複製而已。

本研究採社會制度論的觀點，從兩個面向檢視制度，一爲正式的規則，二爲共同的觀點或持守的規範。爲配合研究主題，正式的規則聚焦於日本式資本主義中，政府與財團之間的穩定網絡關係。而共同的觀點與規範，則聚焦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下，政府、財團、常民在社會階層與土地利用上的認知。基於對制度的理解，導引出政府與財團之間在偏鄉振興上的合作模式，以及偏鄉住民的行爲模式，進而檢視偏鄉振興的樣態。本研究藉由這個分析脈絡，呈現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

參、日本式資本主義之制度架構與影響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美式資本主義有明顯之差異，因而針對日本能否被稱爲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問題，引發了不同的看法。Johnson (1990: 44)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認爲日本所發展的是「不同種類的資本主義」，既非亞當史密斯或馬克思所稱的那種，也不是美式的資本主義。Lipset (1996: 215) 則認爲，有一種極端的說法，是把日本經濟描述爲一種市場的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或共產式的資本主義（Communistic Capitalism）。[1] 日本經濟學者竹內靖雄指出了前述各種不同看法的根源，他認爲日本是表面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但若從日本人的心理狀態來看，其實是個社會主義國家（Takeuchi, 1998）。這種說法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理解，首先是以「村」爲文化基礎結構的集村社會，這個源於德川幕府時期之繳納糧稅的基本單位，被賦予一種集體責任，不論是農耕活動或灌溉溝渠的建設，都需要村民的共同合作。這使得集村意識根深蒂固於日本文化中，即使今日，此種集村概念存在於各種形式的社會單位中，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隸屬於某個團體，例如公司、地方社團、住所的社區等等，他們對於所屬團體自然產生責任感而共同合作，透過共識的凝聚來解決問題。此種文化不僅未見於西方國家，連亞洲其他國家如中國或印度，皆相當少見（Fukutake, 1989: 33-40）。

其次，日本政府認爲，純粹追求市場經濟是有問題的，因爲全然的自由會導致市場失靈，促使追求狹窄私利，缺乏對國家目標與公共利益的重視，即使是要發展經濟，也不能忽略公共利益（Okimoto, 1989: 10-12）。明治維新開啓了日本工業化的道路，然當時日本政府的角色卻與西方工業國家的政府不同。日本政治菁英扮演著「計劃者」的角色，一方面認爲應汲取西方國家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經驗，另一方面則刻意融合傳統與現代，保留所謂的忠誠與武士精神，使其與現代技術所帶來的物質效率並存。在意識型態上傳承了後封建時期的皇權與階級觀念，使政府的角色具有正當性，所以日本只有在科技物質的層次上有新、舊日本之分，但在精神上則沒有如此明顯的分野（Nakane, 1973: 119-120；Suzuki, 1984: 100；Veblen, 1998: 251）。在代代傳承的文化中，個人不是個人，而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群體，在所屬的群體中，有著義務、責任與服從關係（Doi, 2001: 40-44），下層對上層有義

[1] 此爲一種極端說法，意指日本現代經濟發展路徑仍承襲明治維新時期的計劃經濟精神，爲了利用資本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而構築出一套獨特且層級節制的經濟與社會系統，以降低常出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確定性（Lipset, 1996: 215）。本文後續提到的集村意識與系列，就是鑲嵌於這個獨特的經濟與社會系統中。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務與忠誠，而上層對下層則是父權般的保護與支持。由於階層的觀念深植人心，所以日本人傾向於接受現狀的不平等（Traindis, 1990: 103）。

雖然日本具有根深蒂固的階層觀念，但相較於西方工業國家而言，卻是較爲體現平等的國家。從 OECD 國家的吉尼係數變化趨勢來看，日本的吉尼係數相較於英、美較低（OECD Stat, 2019），就稅制而言，日本針對高所得者採高稅率，而且遺產稅率也高，所以日本資本家跨代累積財富的速度比西方工業國家的資本家較慢。同時，日本大企業家較少炫富行爲，反而會因與員工過著相同的簡樸生活而受到稱讚，這也是爲什麼日本會被戲稱爲最成功的共產國家（Koike, 2015）。前述的理解對於本研究而言是重要的，一方面避免誤解日本的資本制度發展與西方工業化國家如出一轍，另一方面能夠不偏廢傳統文化在日本資本制度影響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發展背景與特質

(一) 發展背景

日本資本主義是從 19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開始形成，從棉紡紗、鐵路、礦山等產業的勃興，到造船、鋼鐵產業技術發展，期間經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軍需擴張，使得軍用產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不論是財閥系大銀行、具高利貸性質的中小銀行、或是提供二者強力支援並與政府財政密切關聯的日本銀行，皆承接國債，融資產業，持有產業的有價證券，形成金融與產業環環相扣的體系。其中資本累積最快，促進大資本對金屬礦業的獨佔化，卻同時造成大量公害的，即是礦業（石井寬治著，黃紹恆譯，2008：216-246、272-275），而本研究個案瀨戶內海上的直島，就曾是典型的礦業污染區。

日本資本主義型態異於西方，特別是在資本集結與勞動條件上。首先，國家資本佔壓倒性優勢地位，財閥資本則處於補足的位置，政府與財閥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其次，在勞動力的供給上，半封建地主制使佃農無力負擔高地租，佃農家庭不得不釋放勞動力至其他產業（例如衣料生產部門）尋求勞動收入，因此也造就出大量低工資、勞動條件惡劣的產業現象（鹽澤君夫、近藤哲生著，黃紹恆譯，2001：222-223）。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二戰之後，日本經濟制度在美國監督之下重整，但是，由政府、金融業與企業之間所產生的連結，並沒有因改革而潰散，相反的，在種種國內外政治考量之下，仍保留了形式上的天皇制度，且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並未削減，財閥系企業依舊集結，後來甚至發展成爲所謂的「系列」（keiretsu），即透過股份的相互持有而形成獨特的資本經營模式。主導國家成長的大企業制約了國家政策，而且，在永業制之下，勞動力無限制的付出，產生過勞現象。此外，二戰後雖然表面上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被農地改革解體，但改革只限於農地，其他如山林、市街地之地主都不在改革範圍內。更重要的是，當時麥克阿瑟憲法草案中原希望明文規定，土地與一切天然資源的最終權力在於全體國民的代表（即國家）手中，但此種「土地使用應服膺於公共利益」的精神最後並沒有入法，以致於日本在「擁有土地」與「使用土地」之間，仍承襲戰前的半封建制度的思想，較少參雜公共利益的考慮，地主在土地使用上具有崇高的權力（石井寬治著，黃紹恆譯，2008：385-395；Grad, 1948: 131-133）。

(二) 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特質

二戰後的日本之所以能享受高速的經濟發展，除了因爲戰敗國必須捨棄軍事發展以外，政府、大企業、與政治家之間的鐵三角關係更是關鍵（Imada, 2010: 31），在這個基礎之上，日本發展出「以公司爲中心」的社會與經濟文化，簡稱公司主義（Companyism），直接主導了日本社會的價值觀，形成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是辨別日本式資本主義的關鍵要素（Hall & Gingerich, 2009；Hall & Soskice, 2001；Yamada, 2000: 20-22）。此外，源自明治維新時期對土地所有權的確立與保護，促使了戰後土地資本市場的形成與經濟起飛，亦成爲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礎（Sorensen, 2010）。

公司主義由兩個要素組成，分別是就業安全與管理安全。就業安全指的是公司給予工作永續的保障，而勞工則以永無止境的工作態度來報答，這可以從日本社會中的集團主義來解釋。與美式勞資關係不同的是，美國勞工比較在意勞動薪資與福利，日本勞工則比較在意工作的有無（Yamada, 2000: 20-22）。日本有許多保障就業的制度，甚至在景氣蕭條時，也不裁員，而是以減產或調整員工工作項目來因應。日本 1975 年制訂的《就業保險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便規定，政府在景氣蕭條時必須提供公司財務補助以助其進行上述的調整（Uni, 2000: 65）。管理安全指的是企業與銀行之間的資本融通關係，以銀行爲中心的企業體，形成了非常複雜的企業相互持股的網絡結構（Yamada, 2000: 26）。銀行提供資金與商業資訊給企業，企業則讓銀行賺取鉅額的利息。此外，企業集團之間的交叉持股可避免惡意併吞，維持公司的穩定，使企業在經營管理上有安全感，整個系統又鑲嵌於政府的產業政策中，穩定又有效率（Streeck & Yamamura, 2003；Witt, 2006: 12；Yamada, 2000: 27）。

除了公司主義以外，日本社會對於土地所有權的保護程度，也與西方相異。雖然土地私有化與資本化是資本主義世界共同的特質，然而相較於西方國家，日本對於土地所有權的保護較多，對土地使用應服膺於公共利益的概念較少，即使經過二戰後的農地改革，但源自於明治維新時期對土地所有權的保護網並沒有減少（Sorensen, 2010: 288）。在麥克阿瑟將軍的監督與建議之下，日本政府甘願放棄國家武裝軍備，甚至日皇的實質政治權力，但在眾多地主浩大聲勢的壓力下，土地所有權的極高保障仍舊存在，土地服膺於公共利益的概念始終無法建立。在沿用至今的憲法中，明敘土地所有權的不可侵犯性，雖然其中亦提到土地可爲了公共利益而在適當的補償之下被徵用，但根據語言學家的分析，該法條以日式古文寫成，在語意上並無硬性規範之意（Inoue, 1991: 90）。源自明治維新時期的土地觀念深植於日本社會 100 多年，雖然近代日本試著在法律中強調公共利益的優位性，土地的社會意義與價值開始受到重視，例如 1989 年《土地基本法》強調土地公共性，與 2005 年的《景觀法》確立城鄉風貌作爲全民共同財產的基本建設理念，但此番變革畢竟是近 30 年的事而已。

二、公益資本主義的興起與訴求

異於西方資本制度的日本式資本主義，造就了日本戰後的資本形成與經濟發展，在企業社會責任風潮的帶動下，資本家逐漸地必須思考反饋社會一事，而所謂的反饋，不只是與社會分享利益，近年來更進一步強調應積極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所謂「公益資本主義」因而興起。公益資本主義於 2000 年中期出現於日本，主要倡議者原丈人（George Hara）爲美國加州矽谷發跡的日裔跨國企業家，曾任聯合國跨政府組織的特命全權大使，也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曾受日本安倍內閣網羅諮詢國家財政、經濟與稅務政策，目前擔任日本公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會的最高顧問（公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会，2017a），而其所創立的「聯盟討論會財團」（アライアンス・フォーラム財団）旨在幫助日本企業擴展至開發中國家，利用日本的創新技術解決開發中國家社會問題，使日本成爲開發中國家無可取代的夥伴（Alliance Forum Foundation, 2019）。

什麼是公益資本主義？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鼓勵私人企業自願以對社會有利之方式尋求利潤的經濟制度（Brunner, 2012: 24），使企業管理者基於道德做決策，培養出有利於所有利害關係者的策略習慣與價值（Brunner, 2012: 26）。原丈人批評傳統以追求股東利益爲主的資本主義，認爲這是造成許多社會問題與外部性的主因，他提倡的公益資本主義是以利害關係者爲中心的制度，包括公司的員工、顧客、股東、以及地方社群，都應分享企業利益（Hara, 2009）。公益資本主義的追隨者想要恢復深植於日本傳統商業行爲中的三方受益（三方良し）價值（Brunner, 2012: 26），根據日本大辭典《デジタル大辭泉》的解釋，是指江戶時代近江商人所創造的一種讓買方、賣方與社會三方都滿意的商業模式（デジタル大辭泉，2019）。簡言之，公益資本主義倡議者主張資本主義應具有提升公共利益的功能，幫助解決社會問題。

在公益資本主義的實作上，倡議者對外提供技術解決開發中國家之社會問題，對內則透過與政府部門和其他非營利組織的合作，進行地域振興與孩童教育支援（公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会，2017b）。例如，原丈人以私人企業（日本 KDDI 與美國 Defta Partner）與非營利組織（BRAC）合資（joint venture）的模式在孟加拉成立寬頻網路公司 bracNET（bracNET, 2017；Hara, 2009），旨在推廣無線網路至廣大的偏鄉地區，由於公司利潤會有 40% 流入 BRAC 以支持社會公益計畫，此種合夥模式備受世界銀行的推崇（Hara, 2009: 24-25）。至於在日本國內，瀨戶內海群島的地域振興就是一例。開發者倍樂生財團[2] 理事長福武總一郎強調，財團是基於公益資本主義的精神以藝術活化瀨戶內海因工業污染而沒落的小島（天下編輯部，2017；謝錦

[2] 原名福武財團，1995 年改名爲倍樂生（Benesse）。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芳、賴至巧，2017；鈴木款，2018）。該財團旗下有 30 幾家公司，其中的「直島文化村公司」（株式会社直島文化村）主掌直島、豊島、犬島等地的美術館、飯店與公共藝術品的經營管理（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 2019）。而該財團所成立的「公益財團法人－福武財團」，亦主導直島、豊島、犬島爲主的美術館事業，以及瀨戶內海藝術祭的各項活動（株式會社ベネッセホールディングス，2019）。從該公益財團法人 2018 年的事業計劃與收支預算書中，瀨戶內海地域振興是該財團的重點工作項目，援助目的是振興地域文化與增加當地人口（公益財団法人福武財団，2018）。

三、日本式資本主義對企業公益行為的影響

由於公益資本主義出現至今只有 10 幾年，實務操作尚未被系統性地檢視，因此爲了解日本企業公益行爲的動機，本研究從最貼近公益資本主義概念並行之有年的企業社會責任，來檢視日本企業擔負社會責任的動機與表現。企業社會責任就是追求利潤的企業開始承擔對社會的責任，於進行商業行爲時考慮到對利害關係者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在定義上並不等同於公益資本主義，因爲後者更強調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利他主義（宮崎哲也，2009: 178），也需要企業挹注更多的經費（Hara, 2009），但二者都倡議私人企業的營運策略須有道德意涵，並顧慮利害關係者。因此，檢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樣態，就能窺得公益資本主義在現實操作上的可行性，畢竟後者需要公司股東讓出更多利潤。

一個比較 OECD 各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顯示，日本企業社會責任的積極表現普遍偏低，但不法或具爭議性的行爲則比他國少（Jackson & Julia, 2017）。相較於美國企業，日本企業的資深經理較不重視股東利益（Witt & Stahl, 2016），反而比較在意勞工福利以及公司長期的穩定正當性（Witt & Redding, 2012）。而日本巨大綿密的社經網絡使其商業制度變革非常緩慢與困難（Witt, 2006），此現象也反應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上。一個針對全球 199 個高階經理人的調查研究顯示，日本企業在環境關懷、社區關係、以及職業安全方面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比較好，但若會影響企業組織內部權力動態改變，則較難實現，例如注重股東需求、降低執行長的權力、移除女性的玻璃天花板等等（M2PressWIRE, 2005）。而在同一研究中也發現，

臺灣大學藝術類博士資料庫

企業在追求利潤與實現社會責任之間有所掙扎，許多日本受訪者表示，日本之所以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落後於歐美國家，主因在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良好表現並不會爲公司帶來利益（M2PressWIRE, 2005）。

當然，有論者認爲，日本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不能用西方的指標來檢視，因爲日本獨有的集體主義或社群主義，已經相當照顧利害關係者的需求，包括員工、員工家庭、顧客、股東等都是。換言之，西方國家倡議的企業社會責任，有許多元素早已體現在日本的勞資關係與企業顧客關係中（Krukowska, 2014；Suzuki et al., 2010: 380）。然而，公益資本主義對於企業的要求更多，道德標準也更高，不僅強調利他主義，還要幫助解決社會問題。私人企業本來就不是慈善機構，要一間營利導向的企業解決社會問題並與社區分享利潤，那麼就要看承擔投資風險的股東與爲企業賣命的員工，願意讓利多少。

四、小結

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理應非常具有說服力，偏鄉若能有企業願意挹注資源，必有助於地域活化，這也是近年來此種操作方式在日本盛行之因。然而，日本式資本主義制度上的獨特性，再加上偏鄉異於一般地區的特質，使得利他的公益資本主義反而將明顯的階層差距帶入偏鄉，並產生外部成本。本文將從日本式資本主義制度特質，以及在此制度中政府、財團、常民在社會階層與土地利用上的認知與作爲，檢視公益資本主義在實務操作上的侷限性。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日本內閣府地方創生事務局所公開的 88 個地方創生事例中，篩選出瀨戶內海小島作爲研究對象，選擇理由主要有三。首先，相較於其他案例的規模、產業類型、與地域涵蓋而言，瀨戶內海離島振興是所有案例中唯一橫跨多個縣（沿瀨戶內海共有 7 個縣）的廣域合作案例，而且其振興項目較爲完整，從觀光、文化、服務、商品通路等，非常全面（內閣府地方創生事務局，2017：45）。此案例不只是振興特定地方產業，或是特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社區，而是整個區域的全面振興，因此，本研究能同時觀察離島個別的振興現狀，也能觀察群島整體的振興樣貌，可說同時具有巨觀與微觀的視野。其次，瀨戶內海諸島的國際藝術祭已行之有年，深具國際知名度，也是公認的偏鄉振興成功案例，我國交通部、文化部皆曾因此派員考察並激賞其振興成效（文化部，2016：9；交通部，2018：33）。第三，深究瀨戶內海諸島的歷史，發現其中的直島、豐島、犬島三島具有類似的歷史背景，他們都有過產業興盛豐饒的過去，也經歷過環境危害與人口外移，而目前福武財團分別在這三個小島上都設立了知名的美術館，成爲藝術祭的觀光重點，因此提供了檢視企業資本影響偏鄉的共同基礎。

本研究於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11 日進行田野調查，期間訪談當地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與島民，並於出發前已充分檢視相關文獻資料。由於本研究目的爲了解倍樂生財團之公益資本主義在瀨戶內海群島的實踐與影響，而既有的文本資料已非常豐富地呈現了財團透過藝術祭對當地的正面影響，且財團本身也有許多出版品說明其對當地的貢獻，因此在移地研究的有限時間中，只聚焦於非財團之利害關係者的訪談，以實地的訪談與觀察，對照文獻資料中對財團的評價。至於田野觀察的重點，由於瀨戶內海群島一向被外界認爲是文化藝術振興偏鄉的典範，因此觀察聚焦於與振興相關的設施、觀光相關產業（食堂、零售店、飯店、民宿、交通）以及觀光對小島帶來的各種可觀察的影響。此外，亦從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蒐集當地歷史、文化、觀光等文件資料，以及政府統計資料。因此，本研究資料來源主要有三，分別是訪談逐字稿、田野觀察筆記與在地蒐集的文件資料與學者專家的研究相關報導與報告。

受訪對象的選樣方式有二，第一是搜尋政府部門與在地非營利組織，事先以電子郵件約訪，經此途徑而接受正式訪談者有 13 位。第二是在田野調查中採機會選樣，在島民同意的情況下訪談，經此途徑而接受室內正式訪談者有 2 人，室外非正式訪談者 10 人，總結此次田野調查受訪人數，正式受訪者共 15 人，非正式受訪者 10 人，所有受訪者身分與訪談方式如表 1 所示。正式訪談在受訪者同意之下錄音，而巷弄之間的非正式訪談，則是在訪談後迅速以錄音機錄下訪談內容與重點，成爲觀察筆記的一部分。爲了訪談過程的流暢，本研究採非正式對話訪談法（informal conversational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資料庫

表 1 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受訪者一覽表

受訪者類別	受訪者代碼	身分	訪談方式
政府部門	G1	香川縣直島町 町長	正式
	G2	直島町總務課 係長	正式
非營利社區組織	N1	直島町婦人會會長	正式
	N2	直島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會長	正式
	N3	直島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會員	正式
	N4	直島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會員	正式
	N5	豐島：廢棄物對策豐島住民會議 事務局長	正式
島民	R1	豐島：家浦港邊シーサイド大西 餐廳老闆	正式
	R2	豐島唐櫃港邊涼風庵茶店女主人	正式
	R3	犬島精煉所美術館志工	正式
	R4	豐島唐櫃港邊章魚燒店老婆婆	非正式
	R5（島民 4 人）	豐島：家浦港橫尾館附近	非正式
	R6	犬島 Project A Art House 旁住宅	非正式
	R7	豐島：家浦交友館附近	非正式
香川大學	U1	香川大學教授	正式
	U2（學生 4 人）	直島咖啡廳經營團隊	正式
觀光客	T1（遊客 2 人）	來自法國，建築系學生	非正式
	T2	西班牙觀光團導遊	非正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interview）（Patton, 2015: 437），訪談前只擬定幾個重要問題，無固定的提問順序，而提問時會隨著訪談情境與受訪者所言，而採不同的措辭。訪談題綱如附錄一所示。其中，經營香川大學直島咖啡廳的學生團隊受訪者有 4 位，由於每一位提供的說法一致性高，因此不個別處理訪談資料。

研究資料分析採歸納法，以訪談資料與田野觀察筆記爲主，輔以各類文件與文獻的交叉比對，歸納出三種資料所共同呈現並相互呼應的現象。爲分析訪談資料、田野觀察筆記與文件資料，所有資料皆採兩循環編碼，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循環採開放編碼方式，過程中混和實境、描述、價值與評估編碼，第二循環則採主軸編碼，將第一循環編碼結果進行分類，找出受訪者之間，以及資料與資料之間所呈現的規律模式。

伍、瀨戶內海地域振興個案簡介

日本政府基於國土安全、環境保育、人口下降與老齡化的問題，早在1953 年便制定了離島振興法，並且陸續針對人口急遽減少之地區制定《人口減少地區自立促進特別措置法》(《過疎地域自立促進特別措置法》)、《地方再生特別措置法》、《地域再生法》等等（內閣官房內閣廣報室，2019a）。安倍政權於 2014 年 9 月 3 日第二次安倍內閣就職典禮宣布設立地方創生的主導單位「街町、人、工作創生本部」(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內閣官房內閣廣報室，2019b），整合前述各種地方振興與活化策略，成爲地方創生政策之下的推行項目，而且明確定義地方創生的目的是爲了避免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等大都會區，期望透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力量的合作，從文化、社會、經濟等面向來幫助振興人口急遽下降的地區（內閣官房內閣廣報室，2019c）。雖然瀨戶內海群島振興並非在地方創生政策之下啓動的，但目前也有內閣府提供「地方創生先行型交付金」[3] 的支援，並成爲內閣府的地方創生事例之一（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2017：45）。以下簡介瀨戶內海群島的偏鄉特質，以及目前的振興現狀。

一、瀨戶內海群島的偏鄉特質：工業污染的遺毒

瀨戶內海共有 3,000 多個島嶼，絕大多數是無人島，由於地處偏遠，許多高污染重工業都聚集於此，因此留下嚴重的污染。直到今日，從本州搭乘國鐵跨越瀨戶內海進入四國之前，沿海仍可看到重工業林立，例如三菱化學（早期是三菱煉鋁廠）、YKK AP 四國製造所、煉油廠（コスモ石油坂出物流基地）等等。這些工業發展軌跡雖然讓瀨戶大橋上的遊客在視覺

[3] 所謂「地方創生先行型交付金」，指的是由地方自治體先提出地方創生計畫，而由中央政府提供之補助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受到震撼，但只要轉個彎，瀨戶內海的小島美景將映入眼簾。[4] 本研究主要訪查地點爲國際藝術祭中最著名的三個島嶼，分別是直島、豐島、與犬島，這三個島嶼都有發展重工業與環境污染的歷史，甚至豐島還曾是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產業廢棄物非法投棄之地，直到 2017 年 3 月 28 日，才完成最終的清除工作（石井亨，2018：383）。

直島隸屬於香川縣香川郡直島町，直島町雖由 27 個大小島嶼所組成，但只有直島、向島、屏風島是有人島，且人口大都集中於直島，直島的總人口目前 3,000 多人（直島町役場，2017）。直島早期是一個漁村，以漁業與養殖業爲居民主要收入來源，然而三菱材料會社（以下簡稱三菱會社）在當地建立銅冶煉廠，日本各地大量的銅礦多運此冶煉，其後又陸續冶煉較高級的金屬，例如黃金與水銀，因此帶來重度環境污染，扼殺植物樹木而形成禿山。當然，冶煉事業支撐著直島經濟，在 1960～1970 年代三菱冶煉事業的極盛時期，曾經有 7,000 位島民受僱於三菱會社。然而，當美國便宜的銅礦進入亞洲市場之後，日本銅礦失去了價格競爭力，冶煉廠大受衝擊而規模遽減，一半以上的人口外移，直島的經濟自此一蹶不振（Global Enviroment Center Foundation, 2005）。

豐島是直島的鄰近島嶼，屬香川縣小豆郡土庄町（Global Enviroment Center Foundation, 2005），人口只有 800 多人，因 1970 年代被豐島總合觀光開發株式會社非法棄置、焚燒與掩埋有毒產業廢棄物（以下簡稱產廢）高達 56 萬噸，造成豐島的生態浩劫，也導致豐島島民普遍罹患氣喘與呼吸道疾病（豊島事件と產廃問題，2004）。在居民持續抗議之下，香川縣政府於 1999 年提出由直島承接產廢中繼處理工程的建議，而直島居民認爲藉由產廢處理事業可彌補三菱會社的式微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因此於 2003 年同意設置產廢中繼處理場。然而，污染的污名化對島民帶來衝擊，例如島上農產品輸出前被中盤商要求必須先去除產地辨識標籤（Inoue et al., 2015: 10-11），而漁產也面臨市場嚴峻的挑戰，香川縣政府甚至需要編列預算補償島民因污名化造成的經濟損失（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 2019）。在 2017 年 3 月豐島污染清除工程終於完工，受訪者 N5 帶領筆者到現場勘查，大

[4]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瀨戶大橋；日期：4/1/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片的荒土令人難以想像那裡曾有其記憶中的美麗景緻，而且根據 N5 的說明，該地在 2018 年又發現更深的污染土，因此除污工作又開始進行。

犬島隸屬岡山縣岡山市，是該市唯一的有人島。依據 2015 年的人口調查，島內總人口 44 人，其中 65 歲以上的人口就有 32 人，是一個極端老齡化的小島。犬島總面積很小，徒步繞一圈只需約 1 小時（岡山市役所，2019）。雖然面積很小，但卻有盛極一時的產業，例如 1899 年大阪築港開始，犬島石就輸出提供大阪港的建設，當時犬島港邊人聲鼎沸。犬島上的煉銅廠於 1910 年建立，其後又有日本硫磺岡山工場進駐，所以島上人口曾經維持在 1,000 人上下，而當這些產業沒落，人口便迅速流失（在本桂子，2007：20-21）。犬島的產業發展爲當地帶來的環境影響至少有二，其一是犬島石的大規模挖掘造成土地的減損，其二是煉銅廠冶煉過程中所產生的毒氣毀損了島上的綠地與植物（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164）。

二、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的發展與現狀

瀨戶內海的地域振興始於「直島文化村」的構想。在 1985 年 11 月，正在尋找國際露營場興建地點的福武書店創業社長福武哲彥，與企圖在直島南方發展觀光的三宅親連町長，因理念相合而產生共同發展直島的默契。然福武社長隔年驟逝（Akimoto et al., 2000: 218），他想「爲孩子們創造一個有夢的島嶼（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の夢のある島を創りたい）」的夢想，便由其子福武總一郎接手執行（Akimoto et al., 2000: 3）。現任社長福武總一郎從 1987 年開始購買直島南方的土地與 4 個離島，於隔年在直島町議會發表發展構想，並請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進行建築設計。文化村在 1992 年開始營業，陸續建設了倍樂生別館，並於 1997 年著手購買或租賃島上舊宅，邀請藝術家於舊宅中展演藝術作品，稱爲「直島・家計畫」（直島・家ポロジェクト）（Akimoto et al., 2000: 244）。其後，聞名於世的地中美術館、李禹奐美術館等，也陸續在 2000 年代於直島完成。

從在地觀察中發現，直島在所有瀨戶內海藝術島嶼中，發展相對完善與現代化，常駐之現代藝術作品與大型美術館數量也最多。[5] 而當倍樂生

[5]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豐島、犬島；日期：4/3/2018、4/4/2018、4/8/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公司發現了「跳島商機」── 即吸引觀光客在島與島之間遊走探訪藝術作品的獲利模式，才開始發展其他島嶼的觀光產業，在豐島設立美術館、心臟音檔案館（心臓音のアーカイブ）與豐島橫尾館，而在犬島則把煉銅廠遺址改建爲美術館，並增加幾個「家計劃」展點，並於巷弄空地上設立大型現代藝術品。在外人眼中，藝術祭藉由藝術與在地文化的結合，爲人口逐漸減少的小島帶來活力，並振興地方經濟。

雖然藝術祭被認爲是偏鄉振興的良藥，卻有研究顯示，有相當比例的住民抱持負面態度。香川大學瀨戶內圈研究中心在 2010 年第一次藝術祭舉辦後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直島與豐島受訪者中分別有 42.1% 與 34.9% 表示對藝術祭沒有期待，而且島民最不熱衷的就是「與外人交流」與「藝術作品的鑑賞」（室井研二，2011：9-16），這與倍樂生財團強調藝術品爲島民與觀光客帶來交流的機會，形成矛盾。而當問到藝術作品是否反映了當地的歷史文化，直島與豐島受訪者抱持正面態度者分別只有 20.8% 與 31.7%。此外，強調住民參與的藝術祭，不論是在協力製作、在地材料提供、或是參加藝術祭活動等方面，豐島與直島都呈現非常低的參與率。而整體而言藝術祭是否對島嶼帶來有利的變化，直島受訪者只有 32.6% 認爲有，而豐島則是 55.8% 認爲有。但對於三年後是否希望再舉辦藝術祭，直島與豐島分別有 33% 與 64% 表示希望（室井研二，2011：9-16）。這個問卷調查結果令人意外的部分在於，直島上的藝術品展示，應是所有島嶼中品質最高的，但顯然直島住民對於藝術祭的反應反而是最差的。誠如日本藝術家川俣正所言，藝術祭所在地的村民或許並不介意有外人進來參觀，但他們的日常生活則是完全不同的事（轉引自 Kajiya, 2017）。

陸、在公益與私利之間：研究分析結果

公益資本主義以公共利益爲訴求，旨在解決社會問題，但資本家經營的並非慈善事業，因此在社會公共利益與企業私利之間的權衡與操作，將影響著偏鄉振興的結果。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的舉辦，把曾被稱爲禿山的直島、產廢之島的豐島、與幾乎要成爲無人島的犬島，轉化爲現代藝術之島（現代アートの島），環境污染的島嶼印象已經不再，污名化的去除可說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相當成功。法國觀光客 T1，提到來訪目的就是欣賞安藤忠雄等知名設計師的建築，對於島嶼污名的過往則完全不知情，[6] 甚至連日本導遊 T2，也表示對於島嶼的污染一無所知。[7]

除了翻轉了島嶼的污染形象以外，本研究受訪者對於以藝術振興小島的操作，大都表現出正面的態度，而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提升了島民對居住地的自信，產生榮譽感。G1 認爲，大量遊客遠道而來，提醒了島民居住地的美好，他們維護環境的態度會變得較積極。G2 則提到，大家現在認爲直島是「有很多美麗的藝術作品的小島」，這種對於直島印象上的改變，是有目共睹的。U1 也提到，「居民了解了直島的文化價值，會因此具有榮譽感」。

第二，藝術祭帶來的觀光客品質較高。G2 說，「來到島上的人都是比較『上品』的人」，但如何判斷遊客的品質呢？N1 的回答相當具有代表性意義，他說：

> 我們這些看不懂（現代藝術）的人，看到那些看不懂的東西，就會覺得有一群人要來這邊看這些我們看不懂的東西，所以這群人應該有一種很高的素養或是什麼的。

這種說法隱含著自我貶抑的謙卑，也反映了「他們」與「我們」在藝術素養上的高低之分，對「他們」產生了莫名的高估。前述曾提及，日本在意識型態上傳承了後封建時期的階級觀念，所以日本人傾向於接受現狀的不平等，而此種現象明顯反應於受訪者對於遊客品質的判斷上。特別是藝術祭的主導者是具有社經優位的財團，而日本文化中對於提供大量工作機會的財團又有崇敬之意，自然會產生此種判斷。

然而，以藝術祭活化小島的成效如何呢？觀光客是否爲島上帶來更具體的利益，例如活絡地方經濟，增加工作機會，防止人口外流？以下先從各島人口數變化，以及與觀光產業直接關聯的服務業就業人數，來檢視人口外流的趨勢是否受到抑制。接著再基於訪談資料、觀察筆記、與文獻資料，

6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豐島唐櫃港；日期：4/7/2018。

7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高松至豐島船班；日期：4/4/2018。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檢視以資本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操作，如何在偏鄉帶來明顯的階層差距。

一、人口變化趨勢

(一) 直島

直島是最早發展觀光產業的，從 1989 年的國際露營場、1992 年嘗試結合美術館與飯店住宿的倍樂生之家，到 1994 年開始舉辦的現代美術展（著名的草間彌生大南瓜作品便在此時展出並留置至今），以及後續完成的更多旅館、餐廳、美術館與家計畫，說明了直島的藝術文化振興模式執行至今已 30 年（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然即使如此，直島人口仍不斷下降，2000 年至 2015 年從 3,636 下降至 3,105（請參考表 2），總降幅 15%，而從 2010 年第一屆藝術祭舉辦之後，人口降幅還是維持在 5% 上下。但藝術祭後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包括餐飲與住宿）則有些微增加，從 2010 年的 274 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299 人，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從 16% 上升至 18%（請參考表 3）。

(二) 豐島

產廢事件對於豐島環境造成的重創，是倍樂生財團對外宣傳豐島觀光時常提到的（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192），顯然這段慘痛的歷史也是個最佳宣傳工具。然而長年爲了污染奔走的受訪者 N5 被問及藝術振興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係時說，「沒有，完全沒有關係」。豐島上最著名的三大藝術設計爲豐島美術館、心臟音檔案館與豐島橫尾館，從福武財團公開的建館資料來看，前二者是豐島旅遊的宣傳重點，都是有計畫地在 2010 年完成以參與第一屆藝術祭（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206；218）。然而，豐島人口持續下跌，2010 年至 2015 年的人口降幅爲 14.8%，比之前的降幅更大（請參考表 2），而因觀光帶來的商機，從事服務業人數從 2010 年的 57 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83 人，其佔總就業人口比例從 15% 上升至 23%（請參考表 3）。

(三) 犬島

財團於 2001 年買下犬島煉銅廠遺址之後，集結藝術家與建築師的智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新裝修，於 2008 年以精煉所美術館爲名開始營業，也成爲 2010 年藝術祭的主打重點（岡山県庁，2013：23）。從精煉所美術館開館至第一屆藝術祭的兩年之中，遊客量成長了 84%，在當時人口只有 54 人的小島上，2010 年總遊客量達 38,500 人（岡山県庁，2013：52）。然而，同一段時間之內，犬島人口仍快速流失，降至 2015 年的 44 人，降幅 18.5%（請參考表 2），高齡化率達 79.6%，高居岡山縣所有離島的第一名（岡山県庁，2013：50）。此外，大批的觀光客並沒有帶來住宿的需求（岡山県，2013：52 表 6），服務業就業人數只從 2010 的 3 人上升至 2015 的 5 人，島上的就業總人數一直維持在 15 人（請參考表 3）。

表 2 人口變化趨勢

	2000	2005	2000-2005 降幅	2010	2005-2010 降幅	2015	2010-2015 降幅
直 島	3,636	3,476	4.4%	3,277	5.7%	3,105	5.3%
豐 島	1,327	1,141	14.0%	1,018	10.8%	867	14.8%
犬 島	84	65	22.6%	54	16.9%	44	18.5%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下列資料自製表格，直島、豐島資料來自香川県庁（2019），犬島資料來自岡山県庁（2013：50）與人口統計ラボ（2019a）

表 3 服務業就業人數變化

	2010			2015		
	服務業就業人數	就業總人數	比例	服務業就業人數	就業總人數	比例
直 島	274	1,701	16.0%	299	1,654	18.0%
豐 島	57	388	14.7%	83	367	22.6%
犬 島	3	15	20.0%	5	15	33.3%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人口統計ラボ（2019b）自製表格

總結三個小島的人口變化趨勢，各島總人數持續下降，直島的人口降幅在 4%～6% 之間，藝術文化的振興並沒有抑制島上人口外流。豐島的人口降幅反而是在藝術祭之後最高，爲 14.8%，而犬島人口數已經太少，觀察百分比雖然無太大意義，但仍可見降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島是三

臺灣大學圖書館

個島嶼中人口降幅最低的，原因在於直島仍有營運中的三菱會社與直島町役場，其他島嶼則完全沒有較大規模的產業提供就業機會。

二、你的小島不是你的小島──消失中的住民主導性

在田野調查期間與島民的接觸中發現，小島民風簡樸，例如從 R5 一群老嫗的互動可知，他們從小一起長大，彼此熟識且感情相當融洽。[8] 而 R7 在與筆者交談中不斷數算著鄰居家裡的大小事，並與鄰居閒話家常，展現了鄰里間的深厚關係。[9] 在如此樸實無華的小島上，倍樂生財團確實帶來了觀光人潮，但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制度特質與制度中政府、企業與常民的價值觀，影響著他們的思考與行爲模式，間接地使在地居民在振興過程中失去主導性。有趣的是，島民的主導性並非經過激烈的衝突而失去，而是在無人刻意掠奪，也無人意圖放棄的情況下，自然消失在財團與島民的鴻溝之間。

以下將從制度規則與共同觀點兩大面向，來檢視政府、財團與常民的行爲模式，以及其所導引出的偏鄉振興樣貌。在制度規則的面向上，檢視政府與財團之間的合作模式所引導出的由上而下、由內而外的振興途徑，以及常民對於政治與經濟威權的習慣性服從，帶出島民在振興過程中失去主導性的現象，包括島民與財團之間對於振興定義的不同調、振興模式並非爲小島量身打造而是複製他處的獲利模式、財團掌握在地文化詮釋權、以及振興實質獲利歸屬財團。至於共同觀點，則從傳統對土地所有權的認知，帶出島民失去主導性的現象，包括小島土地被財團大量收購、島民日常生活成爲觀光財、以及島民承受觀光所帶來的外部成本。

(一) 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途徑導致住民主導性的消失

政府與企業之間強力穩定的網絡關係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與制度特性，當財團與地方政府合意振興經濟衰退人口老化的偏鄉，一個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模式便自然成型。同時，島民面對政府與財團的

8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豐島家浦港橫尾館附近；對象：4 位島民；日期：4/6/2018。
9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豐島家浦交友館附近；對象：1 位島民；日期：4/6/2018。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合作計畫，一方面習慣性的服從，一方面也期望見到島內人口增加，所以將振興計畫視同救命稻草一般（Inoue et al., 2015: 10）。

直島町役場與倍樂生財團之間的合作關係從 30 年前開始，G1 表示，前町長三宅親連在任長達 35 年，始終執著於直島南方發展觀光產業的願景。在倍樂生財團之前，便曾邀請藤田觀光公司來發展觀光，並幫忙收購整合土地進行開發，然該公司因經營不善而撤出直島，留下大片荒廢的土地。由於三宅町長不願放棄，又適逢財團正在找地興建露營場，便協調財團購買這片荒地進行開發。對於政府部門而言，財團的做法符合當時町長的發展理念，當然會盡力協助：

> 對我們來說，也是因爲原本這麼大一片荒廢的土地就放在那邊，所以有一個公司，要進來，要開發，要復興。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我們當然是很正向的，也想要幫助他。可是在金錢的部分，我們是完全沒有出的，只有在需要提出一些申請，或者是一些手續的方面，提供了幫忙。總之，就是在除了金錢以外的方面，我們都有幫助倍樂生（G1）。

從文獻資料中也發現，地方政治人物也幫助財團向島民買地。例如曾擔任小豆島土庄町議員長達 24 年並曾擔任議長的山本彰治先生，因爲認同財團發展豐島的計畫，便幫助說服地主，讓財團順利購買豐島美術館用地（Inoue et al., 2015: 10-11）。當然，地主願意賣地，也是基於成本效益的考量，例如犬島煉銅廠的地主便是因無法負擔維持成本而將土地賣給財團（Inoue et al., 2016a: 12-13）。

財團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也表現在對町役場政策的支援上，例如直島町著名的綠建築──町民會館的建設，由於興建當時遭逢東日本大震災重建與東京奧運興建工程，導致工事成本攀升超乎預期（Inoue et al., 2016a: 9），G1 告訴筆者，該建築興建成本 8 億日圓中，便有財團的捐助。

在日本資本主義之下，民眾早已習慣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在台灣容易被放大檢視的官商合作，在直島卻能順利進行，幾無阻礙。然而此種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模式，卻使得小島振興的定義、操作模式，甚至對地方文化的詮釋，都掌握於財團，而非島民，而島民從地域振興的

臺灣大學 藝術與人文中心

獲益，也非常有限。以下針對島民失去主導性的現象進行分析。

1. 島民與財團對振興定義不同調

對於振興的內涵，政府與島民一致，但卻與財團不同調。對於政府而言，小島最大問題是人口流失，不但地方商業活動因而降低，稅收減少，公共服務包括學校與醫院也會因不符成本效益而減低供給，進而人口流失更加快速。在香川縣與岡山縣政府的離島振興計畫中，抑制人口流失皆是振興重點（岡山県庁，2013）。G1 不斷強調，其施政願景是避免人口流失：

> 對我來說，我最希望的還是，因爲我們人口一直持續減少，雖然觀光客有一直增加，但是直島的人口一直在減少。再過不久，人口就要低於三千人了……我們的小朋友蠻少的，我最終的目標，就是在於維持人口……我們想要增加小孩子，這眞的是我最大的目標了。

G1 的說法與島民的需求相互呼應。一個針對直島與豐島島民的問卷調查顯示，島上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前三項課題，分別是醫療服務與福祉的充實、海上交通的改善、與兒童教育環境的充實，至於觀光振興，則在所有 14 項課題中敬陪末座（室井研二，2011：24），顯然發展觀光並非島民所欲，唯有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的改善，才符合他們的需求。

然而，財團對於地方振興的定義是比較抽象的，現任社長最常提起的便是讓老人重新展開笑容、促進老人年與年輕人、島民與非島民之間的交流等等（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3）。因此，以文化藝術讓老人重展笑顏，順理成章成爲小島活化標語。在福武總一郎與策展人北川富朗合著的專書從《直島啓航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以藝術活化地方》中提到，瀨戶內海藝術祭「不是爲了觀眾或藝術家而舉辦，而是爲了當地居民，以土地再生爲目的……由於現代藝術在當地出現，使得老爺爺、老奶奶精神百倍，不管到了直島還是豐島，這些藝術都讓老人家眞心歡喜……」（福武總一郎、北川富朗著，張玲玲譯，2017：52-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非量身打造的小島振興模式

近年來，日本掀起一股偏鄉藝術祭的流行，在瀨戶內海藝術祭之前，最引領風潮的應是 2000 年開始舉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舉辦地點爲新潟縣南部的十日町市和津南町，也是一個面臨人口外流、高齡化、空屋、廢校、棄耕地等等問題的典型偏鄉（Echigo Tsumari Exective Committee, 2019）。目前在日本偏鄉舉辦的藝術祭很多，例如愛知三年展、北阿爾卑斯國際藝術祭、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三年展、中之条雙年展、石川縣輪島市白米町千枚田、青森縣南津輕郡田舍館村的稻田藝術等等，但複製藝術祭的獲利模式已經開始引起藝術家們的檢討（Kajiya, 2017）。

倍樂生財團複製藝術祭的方式，是直接聘請新潟縣大地藝術祭的策展人北川富朗爲瀨戶內海藝術祭的操盤手，同樣強調現代藝術與在地文化的結合，藝術家來到島上，感受在地文化並設計作品。雖然在藝術祭的宣傳中，總會強調島民參與藝術家的創作，但事實上島民參與的部分極其有限。例如直島上的「角屋」，雖號稱有島民參與，但實際上參與的部分僅是設定作品中的計時器，而且參與者並未被列舉於作品介紹中。北川富朗在一次雜誌訪談中也承認，很少邀請在地居民以藝術家的身分創作，大都是邀集外地人前往發表作品，因爲他認爲作品必須要有趣味，有讓人驚豔之感，才會有人願意來島上參觀（楊天帥，2016：23）。

3. 財團掌握在地文化詮釋權

偏鄉藝術祭大都標榜藝術與在地文化的結合，但是，當現代藝術成爲瀨戶內海群島的新標誌後，遊客透過藝術品所認識的在地文化，卻與島民所認知的小島文化有著明顯的差距，散置於島上的現代藝術作品雖然驚艷遊客，卻鮮爲島民所了解。一個針對島上藝術品的評價調查顯示，當島民被問及是否喜歡島上的藝術作品時，直島與豐島受訪者分別有將近 60% 與 48% 回答不知道，該研究認爲，有一半以上的島民不懂藝術作品，所以才會談不上喜歡或不喜歡（室井研二，2011：9）。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也呼應了這個說法，即使直島的藝術活動已經長達 30 年，豐島也已經 10 年，但島民仍舊無法了解島上的藝術品：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我覺得部分的人，都有點像是「不知道他們要做一些什麼，都是些我們搞不太懂的事情」只是這樣子的態度而已，因爲畢竟這種現代藝術，是居民有點無法了解的東西，所以應該眞的是只有，「他們要搞一些，我們不懂在做什麼的事情」這種的想法而已。（G1）

……去了幾次（美術館）都還是看不懂（N1）

像法國的美術館是不是很大，可以待一整天，但這邊倍樂生的只是一間小小的而已，就比不上。（N2）

有一種，有一些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指的是財團要帶入的現代藝術）要來的感覺（G2）

只去過豐島美術館一次……看不懂……館裡面有水……（R4）

對於藝術文化的感受，本來就是非常個人的，因此更有操作空間。以本研究田調經驗而言，矗立在直島兩個草間彌生的大南瓜作品，雖是該島的重要宣傳工具，也是遊客必定拍照留念的景點，但其鮮豔的色調與小島的靜謐卻令人略感格格不入。[10] 在犬島，古老民宅旁的空地上赫然出現一座巨型透明牆，內嵌艷麗的塑膠花。[11] 幽靜巷弄底由民宅改建的透明屋內，竟出現白色巨型蜘蛛般的裝置藝術，這些作品與一旁的老舊民宅呈現視覺違和感與階層差距感。[12] 而在美術館中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輕聲細語仙風道骨，融入高雅的美術館建築中，這與巷弄中仍有點髒亂的水溝與集結聊天的老婦，形成了衝突的對映。[13]

田野調查過程中的兩個發現，凸顯了財團在經營模式與在地文化之間的取捨。第一個發現是在犬島精煉所美術館，已經 80 幾歲的 R3 在美術館出口處擔任志工，等待著向結束參觀的遊客講述犬島的歷史文化。R3 表示，這個項目是犬島島民向財團爭取的，他們希望遊客能多了解犬島。然而，每位遊客在即將結束參觀之前卻被美術館員工主動提醒，若不願聽志

[10]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宮浦港邊；日期：4/5/2018。
[11]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家計畫 A 邸；日期：4/8/2018。
[12]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家計畫 F 邸；日期：4/8/2018。
[13]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精煉所美術館；日期：4/8/2018。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工說話可逕行離開無妨，顯然，志工對在地文化的堅持並不受到美術館經營者的重視。[14] 這與中島正博（2012：84）的說法契合，該研究認爲觀光客在欣賞藝術作品時，對島上歷史文化的認識極其有限，主要是主辦單位對於藝術作品的介紹並不著重於該作品與當地文化的連結，使得有些住民感到不受尊重。第二個發現則是有關直島的南寺。南寺是由安藤忠雄設計的知名木造建築，財團原欲在島上的極樂寺境內借地建造，寺方雖婉拒但願出借寺外一塊名下的土地，惟須拆除其上作爲老人休憩與社團聚會之處的集會所。在短短 6 個月之後，財團便與極樂寺簽約並拆除了集會所。從南寺興建的紀錄中可以發現，經營者先有設計提案，再找場所，雖然經過談判協調，但集會所既屬極樂寺私有財產，又有意出借給財團，如此的協調結果應不意外（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57）。當遊客驚嘆於安藤忠雄的絕妙建築設計之餘，應該很少探究這段外來文化凌駕於在地文化的歷史吧。

4. 誰掌握了小島振興的獲益？

當藝術祭被政府、財團、媒體與遊客們讚譽爲解決偏鄉問題的有效工具時，或許應該進一步檢視的是，藝術之島的盛名與每年數十萬的遊客，是否爲小島帶來經濟效益？

首先，島上工作機會並沒有顯著的增加。R2 表示，「美術館其實並沒有帶來太多的工作機會」。而筆者從家計畫工作人員處了解到，當地美術館或家計畫的員工大致分爲三類，分別是財團員工、時薪工作者、與志工，他們很少是島民。[15] 從文獻中得知，財團在島上所執行的稻米栽種計畫，雖然目的是將農耕技術傳承給年輕人，但很多員工習得農技之後卻都已離開島上（Inoue et al., 2016b: 10）。

當然，大量遊客多少能嘉惠地方服務業，N3 表示，「餐廳或民宿業者應該是獲益較大者」，而在豐島家浦港邊經營小食堂長達 40 年的 R1 也表示，「如果沒有美術館的話，根本不會有觀光客來。」而 U2 也表示，香川

[14]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精煉所美術館；日期：4/8/2018。
[15]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家計畫（角屋）；日期：4/3/2018。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大學師生之所以興起到島上經營咖啡店的念頭，原因之一就是日漸增加的遊客。從表 3 可知，三個島的服務業就業人口確實有些微增加，但相較於數十萬甚至藝術祭高峰期上百萬的遊客量來看，就業人口數似乎沒有相對應的成長。此外，服務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比例並不算高，尤其直島更是。U1 便直言，「直島沒有強大的產業，都是以農業和石材業等小規模產業爲主，倍樂生公司的經濟貢獻也只是舉辦藝術活動等等，因此直島的主要經濟還是靠三菱公司。」

雖說餐廳與民宿業者獲益較大，但筆者在犬島時卻發現，當天雖逢週日，但當地餐廳與咖啡廳皆無營業，唯一營業之處就是精煉所美術館高雅昂貴的附設餐廳。[16] 難怪居民擔心，犬島白天還有人進出，但到了晚間很可能變成無人島（Inoue & Kawaura, 2015: 9）。其實這樣的發展結果並不意外，因爲犬島小，展點少，一般規劃爲半日遊，因此遊客停留島上時間不長。若眞需要用餐，美術館附設餐廳獨佔了美麗的海灘與海景，應是最佳選擇，[17] 所以餐廳或民宿在犬島並非必需。

其次，地方上的紀念品店乏人問津。N1 提到，「外國的遊客幾乎都不會買（島民製作的）紀念品……他們的錢不會留在這個島上……」這與筆者親身的觀察相符。豐島與直島上由島民經營的紀念品店很少，而且商品看起來頗爲陳舊，似乎擺放很久，至於美術館附設禮品店裡，則有各式精緻又有設計感的紀念品，觀光客皆會駐足於此，這與蕭條的地方小店形成強烈對比。[18]

事實上，倍樂生財團還在島上經營高檔民宿、旅館、餐廳、與小島婚禮，這些建築大都坐落於美麗的海灘邊，擁有絕佳海景，從旁經過時可見高級宴會的盛況，與巷弄中的老宅食堂大異其趣。[19] 總結而言，島民經營的民宿、食堂、土產小店的獲益有限，一方面是因爲財團也經營類似的產業，另一方面高松市與岡山市都在搭船一小時以內的距離，[20] 因此觀光客

16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港邊；日期：4/8/2018。
17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日期：4/8/2018。
18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豐島；日期：4/3/2018、4/4/2018。
19 同上。
20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高松市往返直島、豐島船班；日期：4/3/2018、4/4/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食宿選擇多元，對於島內的食宿需求不足以創造出大量的工作機會。

(二) 土地所有權傳統觀念下住民承受的外部成本

土地與一切天然資源的最終權力在於全體國民手中，而且土地使用不應違背公共利益，這樣的概念，在二戰後的農地改革中，並無機會深植於日本，以致於地主在擁有土地與使用土地之間，不會主動涉及公共利益的考量。財團要在島上發展觀光，當然要大規模購買土地，掌握土地的使用權，至於土地的使用會不會產生外部成本，很少是企業經營時會考慮的重點，更何況，藝術建築並非排放黑煙廢水的工廠，更難聯想到外部性。然而，靜謐的小島在大批觀光客壓境之下，所承受的外部成本是不容忽視的。

1. 小島土地與老宅被財團收購與租賃

從各島作品發展年表來看，大型美術館用地都是由財團購得，而家計畫或公共空間藝術品的展覽位置，則是經由購買或長期租賃而得。地主一旦擁有土地，對於土地的使用便有相當大的自由度，更何況財團是基於公益而振興偏鄉，因此在土地與展場的租賃或購買上，甚或要在國家公園特別區內建造美術館（地中美術館即位於瀨戶內海國家公園特別區內），都能成功獲得支持（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142）。然而，財團購買或租賃的土地或古宅，出現了兩大問題。首先，這些土地並非集中於特定區域，而是散佈於島上，有些在海邊空曠處，有些卻在巷弄中，居民無從選擇必須面對家門外極具震撼效果的大型藝術作品，以及川流不息的遊客。[21]

其次，財團土地獨佔了海景，曾經引發島民的不滿，認爲財團拿走了島上最美的土地：

> 因爲在那塊土地仍然荒廢在那邊的時候，大家是可以自由進出那塊土地的。像是去挖貝殼啊，釣魚啊，游泳啊，但是在倍樂生進來之後，因爲受到了管理，所以說要限制進出。（G1）

[21]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豐島、犬島；日期：4/3/2018、4/4/2018、4/8/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們要拿走直島裡最好的一塊土地。從瀨户内海國立公園還有公車路線的這裡到縣道那邊用來蓋房子……當時直島的人最反感的就是景色最好的地方全部都被拿走這件事，像黃色南瓜那邊。那裡有海邊，但他們禁止直島的人進去游泳，甚至在放了刺鐵絲，他們説那是私有海灘。（N3）

2. 島民生活日常成爲觀光財

由於美術館與現代藝術品的設置散佈於島上，所以騎單車穿梭於展場之間的遊客便很容易侵入安靜的巷弄，因此島民的生活日常也成了觀光宣傳的重點。[22] 一份藝術祭的宣傳品中提到，「走在巷弄中，你常會看到島民在家門口與鄰居談話，老人們聚在一起聊天，時間過得非常沉潛而緩慢，而當你偷偷地望進民宅，在大門與車庫之間那維持良好的庭園中，你會驚訝於島民內斂的美學，與他們是如何用心的過著每一天（Kaneshiro et al., 2015: 7）。」顯然，可以被遊客窺視的島民生活，已成爲小島振興的工具之一。

3. 島民負擔振興的外部成本

從訪談資料來看，小島成爲觀光勝地，確實引起了居民生活上的不便。這些觀光帶來的外部成本，包括觀光客不懂尊重當地文化、隨意照相、島內外的交通擁擠等等。依據筆者本身的搭船經驗，船上遊客常忍不住大聲笑鬧，忽略了這些船班都是島民外出購物、或上班族的日常交通工具，遊客的喧鬧確實讓某些島民面露不耐。[23] 此外，在巷弄中，觀光客亦大聲喧嘩，家計畫的志工忍不住向筆者抱怨，「X 國人講話好大聲，都不聽我們的講解，一直吵一直吵……」。[24] 針對生活上的不便，本研究受訪者提供了以下的說法：

---

22 同上。

23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高松市往返直島與豐島船班；日期：4/3/2018、4/4/2018。

24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家計畫（南寺）；日期：4/3/2018。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國際藝術祭會很熱鬧，本村那邊的人會很辛苦……最大的問題是觀光客他們會占滿馬路……腳踏車也是騎得很快塞滿馬路，我們就覺得有點困擾。(N4)

在役所旁邊就是本村，在那個附近的話，無論如何總是難免的，有許多觀光客走在窄小的馬路上，跟以前比起來的話，當然是變得更多人會經過那邊。(G2)

有時候會覺得很麻煩的是，從宇野有高速船可以坐到直島，可是我們就常常搭不上。雖然有爲居民做一個居民優先的通道，但是還是有很多居民因爲比較善良，所以看到觀光客大排長龍的樣子，會覺得不好意思就這樣子有點像插隊直接上去……最後導致有些居民會打搭不上船……所以是有一點不方便。(N1)

依據媒體報導和問卷調查來看，多數居民對於觀光景點化議題有正面的印象。可是實際上不一定所有人贊成（應該一半一半）。比如說在直島從事觀光業的會歡迎遊客，但是一般居民在內心覺得不太歡迎遊客過來，打擾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對學生說，居民不一定在內心歡迎我們活動。(U1)

從其他文獻資料與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島民認爲觀光客的湧入帶給他們緊張感，需要隨時小心門戶，而且也讓他們的生活失去了過往緩慢的生活步調。本村地區的居民認爲，現在只有在家計畫休館的週一，他們才能看到本村的原貌（Kaneshiro et al., 2015: 3-9）。室井研二（2011）的質化調查研究顯示，許多居民對於觀光客的打擾感到非常困擾，原本島上是步行的天堂，現在再也不是了，甚至有島民表示絕對不希望藝術祭繼續舉辦，也有島民表示他們因此想要遷離久居的小島。

前述這些負面感受都沒有形成抗議聲浪，歸結原因有二。首先，日本社會強調和諧，這使得個人的重要性稀釋於強調和諧的社群之中（Krukowska, 2014: 47），每個個人變得不太重要，他們普遍有著相當內斂的傳統與特質，崇尚幾近自我貶抑的謙虛行爲（大導寺愼吾、黃光國，2009：342），因此並不擅長激烈反對。其次，財團本著地域振興的美意發展觀光，確實有部分島民受惠於服務業的活絡，而且政府也採取合作的態度。有研究顯示，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資料庫

日本經濟起飛所帶來的巨大利益雖然集中於社經菁英，一般民眾被遠拋在後，但民眾只要所得增加且福祉受到保障，對於鐵三角的作爲不會有太多意見（Imada, 2010: 31）。再者，日本人大都以禮待客，公然抱怨觀光客造成的不便，絕非待客之道，U1 也針對此表示，「通常在觀光景點不容易聽到居民的負面意見。」而 G1 也強調，島民們沒甚麼特別反對，都是「默默地看著這一切」。

柒、結論

本研究基於社會制度論的視角，從正式的規則與共同持守的觀點與規範，來檢視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日本偏鄉振興的限制。正式的規則是從政府與財團長久以來發展而成的社經優位與聯合關係來觀察，而共同的觀點與規範則從潛藏於日本社會、經濟、文化脈絡之中的慣性思考模式來觀察，包括常民重視就業穩定性勝於勞動權利、社會高舉國家集體利益而忽略公民個人權益、與根深蒂固的社會階層觀念導致常民對政經權威的習慣性服從。本研究結果分以下兩個部分說明。

首先，研究結果符合社會制度論對人類行爲與制度複製的解釋，發現具有文化底蘊的制度深層地影響著地方政府、企業、與島民的認知與行爲。政府與財團自然的結合並相互支持，政府在行政上幫助財團以藝術活絡偏鄉，而財團則支援政府發展地方政策，二者共同形成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力量。而面對政府與財團結合之下的偏鄉振興策略，島民似乎沒有太多意見的接受了此種模式，雖然從民意調查研究中可看見部分島民的不悅，但並無法形成足以監督的公民社會力量。在本研究的訪談中，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針對於目前的振興模式都表示正面的態度，但只有在長談之後才會透露出較爲負面的意見，顯見受訪者大都有一套「正式」與「正確」的認知與回應方式。事實上，在政府、企業、與偏鄉居民共同的相信之下，以藝術觀光振興偏鄉的途徑，不斷地被學習複製，各地的作法也都大同小異，不論在地文化是否適合作爲行銷工具，「融合在地文化」成爲偏鄉觀光的共同口號與價值觀，提高了觀光振興途徑被各方接受的程度。

其次，研究發現制度限制了行動者的視野，使長期被忽略的不正義持

臺灣大學圖書館

續被忽略，導致在立意良善的制度複製同時，也複製了不正義的制度結果，而且由於偏鄉的脆弱特質，使得此種現象在偏鄉振興的個案中更爲凸顯。本研究發現，在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制度架構之下，由財團主導並與政府合作的振興模式，容易導致偏鄉住民在振興過程中失去主導性，財團主導了在地文化詮釋權，振興模式並非針對小島量身打造，而是複製流行於日本的獲利方式，但島民從中獲取的利益有限，人口仍逐漸減少。此外，安靜純樸的小島出現了顯著的階層差距，財團在島上經營的美術館與高檔服務業，形成一種相異於島民生活的高貴體系，服務著願付高價消費的觀光客。當然，大量的觀光客中，總會有青睞島民提供的低價服務者，但顯然需求量不足以支撐島民經濟。島民對於觀光業帶來的外部性雖然曾於匿名問卷調查中表示不滿，但 3 年一次的藝術祭，在政府與財團的合作之下，一次又一次地舉辦。名聞國際的藝術祭在各界的頌讚聲中，島民的不滿逐漸不合時宜，他們或許逐漸相信，藝術祭的喧鬧是小島的最佳結局。

事實上，志在解決社會問題的財團仍必須考慮經營效率，在執行振興策略時勢必要面臨公共利益與私益之間的權衡。在本個案中，財團的操作邏輯非常明確，要執行振興政策，就要經過專業的規畫並有效率的執行，例如購買海景優美的臨海土地、拆掉老人活動中心以興建南寺等等，都成了必要的手段。此外，要吸引觀光人潮進入偏鄉，就必須加以包裝，而現代藝術、小島苦難衰敗的過往、以及島民的生活日常，正是層層提升商品賣點的包裝，不但讓現代藝術增添了振興偏鄉的使命外衣，小島情懷也成了商品，使小島觀光增加了更多的社會正義與文化藝術的重量。如此的操作翻轉了小島的形象，產廢與禿山帶來的污名，受到現代藝術的美化，瀨戶內海不再與重工業污染畫上等號。然而，島民的小島再也不是島民的小島，雖然不再承受工業污染的外部性，卻轉而必須承受觀光發展的外部性。當然，若只能從兩種外部性之間做選擇，那麼後者顯然比較不那麼致命，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偏鄉住民是否注定只能在不同嚴重程度的外部性之間做選擇？

瀨戶內海藝術祭是我國偏鄉振興的學習對象，然此種振興模式需要財團龐大的財力與政府部門的穩定合作方能成事。我國政府部門對於官商合作相當謹慎，再加上台灣民眾對於官商關係的敏感多疑，使得瀨戶內海振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興模式幾乎不可能複製於我國。但振興偏鄉若無財團支持，單靠政府部門的推動恐難永續經營。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在以下三大原則之下嘗試發展官商合作機制以振興偏鄉。

首先，偏鄉振興必須尊重在地居民的存在，住民的居住環境、文化、其所重視的生活品質等等，都不應成爲振興之下的犧牲品。偏鄉人口外流或老齡化的特性，往往容易讓主事者單方面決定偏鄉住民的需求，而忽略其內心眞正的感受。或許主事者應該探詢的基本問題是，偏鄉是否一定要振興？當地居民對於振興的期盼爲何？外來者是否有足夠的敏感度規畫出尊重在地文化的振興計畫？這些問題的思考，將避免振興工程的主導者片面規劃出犧牲住民福祉的偏鄉振興模式。

其次，偏鄉振興需從社會經濟基礎建設做起。一次性或間歇性的熱鬧活動，絕對比不上常態永續的社經基礎建設，要遏止偏鄉人口外流的惡性循環，需要從惡性循環系統裡尋找解決問題的槓桿，針對住民日常生活中最基礎的需求提供保障，才可能留住青壯人口。事實上，這表示企業需要在當地讓出更多的獲利機會，而非與常民爭利。以本個案爲例，財團在紀念品的販售與餐廳、旅館的經營上，都可與當地民眾合作，共享利潤，財團從美術館入場券獲利，而美術館的周邊商品則可散處於島民經營的商店販售。此外，財團亦可幫助提升偏鄉的社會福祉相關計畫，例如教育與醫療服務，如此才可能留住各種年齡層的居民。

第三，偏鄉振興須重視土地使用與區域規劃。不論是發展哪一種產業振興模式，都不能犧牲偏鄉住民的原有生活型態，因此，振興工程需要注意區域規劃與在地居民的生活動線，例如觀光區需與住宅區分開，讓偏鄉住民保有生活空間。以本研究個案爲例，家計畫雖然旨在老宅再利用，但由於家計畫散處於住宅區，觀光活動直接干擾島民的日常生活，也強迫島民必須面對觀光客。因此，這個案例提醒決策者區域規劃的重要性，不應讓偏鄉住民在生活品質與偏鄉振興之間做選擇，特別是私人企業通常較缺乏社會福祉的敏感度，政府部門若要與企業合作振興偏鄉，勢必得在決策過程中守住區域規劃的原則。

如果偏鄉住民對於振興過程中的階層差距毫無知覺，對於振興模式也毫無異議，那麼政府或企業應採取什麼態度？筆者曾於豐島搭乘地方巴士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時，路經財團經營的高級海景餐廳，當時盛裝參與露天宴會的歐美人士舉杯向巴士裡稀落的乘客致意，而巴士司機樂天地向筆者細數財團在這塊海灘上的億圓投資。外人看來的階層差距，在島民眼裡或許理所當然。社會制度論中所謂不經思索的態度與行爲，應該就屬於這一類。那麼後續的問題是，如果受到制度影響的行動者，無法感知到制度中的不正義，甚或有所感知卻不在意，那麼社經優位者如政府或企業，該如何自覺？該採取什麼態度？這雖然已超出本文之研究範圍，但本研究對偏鄉振興政策的實務提醒是，偏鄉振興的主導者若認爲住民沒有異議便可無所顧慮，那麼根深蒂固的偏鄉問題將繼續存在，只不過是再複製一個人口持續流失的偏鄉振興典範而已。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大導寺愼吾、黃光國，2009，〈台日內團體謙虛行爲之差異〉，《中華心理學刊》，51(3): 341-358。Daidohji, Shingo & Hwang, Kwang-Kuo. 2009. “Tai ri nei tuanti qianxu xingwei zhi chayi” [The Difference of in-group Modesty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3): 341-358.

天下編輯部，2017，〈福武總一郎：幸福不在天堂，而是在現實生活裡〉，天下雜誌網頁，https://www.cw.com.tw/index.php/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670，2019/3/31。Editing Board of CommonWealth Magazine. 2017. “Fu wu zong yi lang: Xingfu buzai tiantang, er shizai xianshi shenghuo li” [Soichiro Fukutake: Happiness is not in the Heaven but in the Real life]. in https://www.cw.com.tw/index.php/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670. Latest update 31 March 2019.

文化部，2016，〈文化部楊政務次長子葆赴日出席第 3 屆「瀨戶內海亞洲論壇」暨視導駐日臺灣文化中心業務〉，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503375/001，2019/3/31。Ministry of Culture. 2016. “Wenhuabu yangzhengwu cizhang zibao furi chuxi disanjie ‘laihuneihai yazhou luntan’ ji shidao zhuri taiwan wenhua zhongxin yewu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Zi-Bao Yang, Attended Setouchi Asia Forum and Visited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in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503375/001. Latest update 31 March 2019.

交通部，2018，〈參加「2018 北海道 yosakoi Soran 街舞及辦理觀光推廣活動」暨關西、東京等推廣活動出國報告書〉，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701273/001，2019/03/31。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2018. Canjia “2018 beihaidao Yosakoi Soran jiewu ji banli guanguang tuiguang huodong” ji guanxi, dongjing deng tuiguang huodong chuguo baogaoshu [Report of Attending 2018 Yosakoi Soran Street Dance Festival and Promoting Tourism for Taiwan in Hokkaido, Kansai area, and Tokyo]. in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701273/001. Latest update 31 March 2019.

楊天帥，2016，〈北川富朗：藝術做爲解決問題的工具〉，《臺南美術：藝術振興地方》，3: 20-25。Yeung, Tin shui. 2016. “Bei chuan fu lang: yishu zuowei jiejue wenti de gongju” [Fram Kitagawa: Art as a Means to Solve Problems]. *Tainan Museum of Fine Arts: Invigorating Communities Through Art Practices* 3: 20-25.

謝錦芳、賴至巧，2017，〈專訪福武總一郎：耗時 30 年把荒島變藝術殿堂〉，中時電子報網頁，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12000352-260114，2019/03/31。Xie, Jin Fang & Lai, Chih-Chiao. 2017. Zhuanfang fu wu zong yi lang: Haoshi 30 nian ba huangdao bian yishu diantang [Interviewing Soichiro Fukutake: Transforming Remote Islands to the Palaces of Art]. in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12000352-260114. Latest update 31 March 2019.

石井寬治著，黃紹恆譯，2008，《日本經濟史》，臺北：五南出版社。譯自《日本経済史》，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Ishii, Kanji. Huang, Shaoheng. trans. 2008. *Riben jingji shi*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Taipei: Wunan Culture Enterprise. Translated from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akyo Press. 1976.

福武總一郎、北川富朗著，張玲玲譯，2017，《從直島啓航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以藝術活化地方》，臺北：遠流出版社。譯自《直島から瀬戸内国際芸術祭へ—美術が地域を変えた》，東京都：現代企画室，2016。Fukutake, Soichiro & Fram Kitagawa. Chang, Ling-ling trans. 2017. *Cong zhidao qihang de laihunei guoji yishu ji: yi yishu huohua difang* [*Sailing from Naoshima's Satouchi Triannale: Revitalizing Local Communities by 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Translated from *Sailing from Naoshima's Satouchi Triannale: Revitalizing Local Communities by Art*. Tokyo: Gendaika Kushitsu Publishers. 2016.

鹽澤君夫、近藤哲生著，黃紹恆譯，2001，《經濟史入門：馬克思經濟學歷史理論概述》，臺北：麥田出版社。譯自《経済史入門》，東京都：有斐閣，1979。Shiozawa, Kimio & Tetsuo Kondo. Huang, Shaoheng. trans. 2001. *Jingjishi rumen: Makesi jingjixue lishi lilun gaishu*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Theory of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Taipei: Rye Field Publications. Translated from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Theory of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Tokyo: Yuhikaku Publishing. 2001.

二、日文部分

デジタル大辭泉，2019，〈三方良し〉，コトバンク web ページ，https://kotobank.jp/dictionary/daijisen/1348/，2019/3/19。

人口統計ラボ，2019a，〈2015 年日本国勢調査：岡山県岡山市東区犬島人口統計〉，人口統計ラボ web ページ，https://toukei-labo.com/，2019/2/28/。

人口統計ラボ，2019b，〈2010、2015 日本国勢調査：職業別就業者數一覽〉，人口統計ラボ web ページ，https://toukei-labo.com/，2019/2/28。

中島正博，2012，〈疎高齢化地域における瀬戸内国際芸術祭と地域づくり：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による地域活性化と人びとの生活の質〉，《広島国際研究》，18: 71-89。

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2017，〈地方創生事例集〉，首相官邸 web 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meeting/top_seminar/h29-01-13-haifu4.pdf，2019/6/5。

公益財団法人福武財団，2018，〈平成 30 年度事業計画・収支予算書〉，公益財団法人福武財団 web ページ，http://www.fukutake.or.jp/art/gaiyou/pdf/naoshimaart/ na_h30_keikaku.pdf，2019/3/31。

公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会，2017a，〈原丈人最高顧問など理事のご紹介〉，公益財団法人福武財団 web ページ，https://picc.or.jp/about/directors.html，2019/3/31。

公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会，2017b，〈Picc の活動〉，公益財団法人福武財団 web ページ，https://picc.or.jp/action_20160802work_1.html，2019/3/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井亨，2018，《もう「ゴミの島」と言わせない〔豊島產廢不法投棄、終わりなき闘い〕》，東京都新宿：藤原書店。

在本桂子，2007，《犬島ものがたり》，岡山市：吉備人。

岡山市役所，2019，〈犬島の振興〉，岡山市 web ページ，http://www.city.okayama.jp/kikaku/kikaku_00058.html，2019/6/3。

岡山県庁，2013，〈岡山県離島振興計画〉，岡山市 web ページ，http://www.city.okayama.jp/contents/000173016.pdf，2019/3/31。

直島町役場，2017，《町勢要覽—資料編》，香川縣：直島町役場。

室井研二，2011，〈瀬戸内国際芸術祭の住民評価とその規定因〉，香川大學瀬戸内圏研究，http://www.kagawa-u.ac.jp/setouchi/h2223houkoku05muroi.pdf，2019/3/31。

香川県庁，2019，〈香川県離島統計情報－人口の推移〉，香川県 web ページ，https://www.pref.kagawa.lg.jp/chiiki/seto-island/statistics/，2019/2/28。

宮崎哲也，2009，《マルクスは「現代」をどう読むか》，東京都：秀和システム。

株式會社ベネッセホールディングス，2019，〈財団と連携したよい地域づくり〉，株式會社ベネッセホールディングス web ページ，https://www.benesse-hd.co.jp/ja/csr/society/foundation.html，2019/3/31。

鈴木款，2018，〈ベネッセ中興の祖が語る 地域再生と教育改革とは〉，FNN PRIMEweb ページ，https://www.fnn.jp/posts/00289450HDK，2019/3/31。

豊島事件と產廢問題，2004，〈豊島事件の発端～安岐正三さんの話〉，豊島事件と產廢問題 web ページ，http://hiroko.s11.xrea.com/x/main/act_locally_1/act_locally_1-33，2019/6/3。

內閣官房內閣広報室，2019a，〈地方創生：関連法令・閣議決定等〉，首相官邸 web 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kakugi_index.html，2019/6/3。

內閣官房內閣広報室，2019b，〈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の設置について〉，首相官邸 web 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pdf/konkyo.pdf，2019/6/3。

內閣官房內閣広報室，2019c，〈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長期ビジョン」「総合戦略パンフレット」〉，首相官邸 web ページ，http://www.kantei.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go.jp/jp/singi/sousei/info/ pdf/panf_vision-sogo.pdf，2019/6/3。

三、西文部分

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Becoming: 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香川県香川郡：福武財団。

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Remain in Naoshima*，岡山県岡山市：株式会社ベネッセコーポレーション コーポレート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室。

Akimoto, Y., K. Ehara, & Y. Hemmi. 2000. *Remain in Naoshima*. Okayama Benesse Corporatio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Office.

Alliance Forum Foundation. 2019. “Business Support.” in http://www.allianceforum.org/en/partnership/?cnt=cnt_01.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9.

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 2019. “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 http://benesse-artsite.jp/. Latest Update 19 March 2019.

bracNET. 2017. “Company Profile.” in http://bracnet.net/company-profile/.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9.

Brunner, D. J. 2012. “Can Japan Lead the World Toward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Japan Spotlight* 2012(May/June): 24-27.

Brunsson, N. & J. Olsen. 1993. *The Reforming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Doi, T. 2001. *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Echigo Tsumari Executive Committee. 2019. “About Echigo-Tsumari Art Field.” in http://www.echigo-tsumari.jp/eng/about/.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9.

Fukutake, T. 1989. *The Japanese Social Structur: Its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Century*.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Global Environment Center Foundation. 2005. “Eco-towns in Japan: Implications and Less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ities.” in http://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8481/Eco_Towns_in_Japan.pdf?sequence=3&isAllowed=y. Latest Update 11 October 2018.

Grad, A. J. 1948. “Land Reform in Japan.” *Pacific Affairs* 21(2): 115-135.

Hafner-Burton, E. & K. Tsutsui. 2005. “Human Righ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Paradox of Empty Promi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5): 1373-1411.

Hall, P. A. & D. Soskice.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s. P. A. Hall & D. Sosk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8.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Hall, P. A. & D. W. Gingerich. 2009.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3): 449-482.

Hall, P. A. & R. C. R.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5): 936-957.

Hara, G. 2009. “Enriching Lives of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Japan Spotlight: Economy, Culture & History* 28(6): 22-25.

Imada, M. 2010. “Civil Society in Japan: Democracy, Voluntary Action, and Philanthropy.” In *Civic Engagement in Contemporary Japan*, eds. H. Vinken, Y. Nishimura, B. L. J. White, & M. Deguchi. New York: Springer, 21-40.

Inoue, K. 1991. *Maca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udy of Its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oue, N. & Y. Kawaura. 2015. “The Islanders.” *Naoshima Note* 1: 8-11.

Inoue, N., Y. Kawaura, & K. Akehi. 2015. “The Islanders.” *Naoshima Note* 2: 9-11.

Inoue, N., Y. Kawaura, & K. Akehi. 2016a. “The Islanders.” *Naoshima Note* 4: 11-13.

Inoue, N., Y. Kawaura, & K. Akehi. 2016b. “The Islanders.” *Naoshima Note* 3: 9-11.

Jackson, G. & B. Julia. 2017. “Understanding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Japanese Capitalism: Some Comparative Observations.” in https://incas.hypotheses.org/.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9.

Johnson, C. 1990. “The Japanese Economy: A Different Kind of Capitalisim.” In *Japanese Model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eds. S. N. Eisenstadt & E. Ben-Ari. London: K. Paul International, 39-59.

Kajiya, K. 2017. “Japanese Art Projects in History (Field 7).” in http://field-journal.com/issue-7/japanese-art-projects-in-history.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9.

Kaneshiro, K., N. Goto, N. Inoue, Y. Kawaura, Y. Tokoda, T. Oguma, A. Fujiwara, T. Urabe, A. Kotoni, M. Nagase, & K. Akehi. 2015. “Honmura--the Place and Its People.” *Naoshima Note* 16: 2-13.

Koike, Y. 2015.” Why Inequality Is Different in Japan.” in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3/why-inequality-is-different-in-japan/.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9.

Krukowska, M. 2014.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Japanese Companies.”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2(4): 39-57.

Lipset, S. M.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mpany, In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2PressWIRE. 2005. “Japan Behind Us, Europe in Adopting CSR.” in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nfh&AN=16PU3808187276&lang=zh-tw&site=ehost-live.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9.

Meyer, J. 2008. “Reflections On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eds. R. Greenwood, C. Oliver, R. Suddaby, & K. Sahlin. London: Sage, 790-812.

Meyer, J. W. & B.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Nakane, C. 1973. *Japanese Societ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OECD Stat. 2019.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By Country.” in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670#. Latest Update 2 June 2019.

Okimoto, D. I. 1989.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ton, M. Q. 2015. *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s*. 4th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Roland, G. 2004.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Fast-Moving and Slow-Moving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4): 109-131.

Scharpf, F. W. 2000.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762-790.

Scott, W. R. 1994.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I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Individualism*, eds. W. W. S. Scott & J. W. M. Mey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55-80.

Sorensen, A. 2010.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Planning in Japa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Land Management.” *Planning Perspectives* 25(3): 279-302.

Streeck, W. & K. Yamamura. 2003. “Introduction: Convergence or Diversity?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In *The End of Diversity? Prospects for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eds. K. Yamamura & W. Streec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50.

Suzuki, K., K. Tanimoto, & A. Kokko. 2010.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Matter? Effec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Japanese Firms.”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9(3): 379-4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uzuki, T. 1984. “Ways of Life and Social Milieu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haviormetrika* 15: 77-108.

Takeuchi, Y. 1998. “Japan’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The Japanese Economy* 26(2): 3-24.

Traindis, H. C. 1990.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ed. J. J. Berma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41-133.

Uni, H. 2000. “Disproportionate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Accumulation Regimes.” In *Japa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A Regulationist Interpretation*, eds. R. Boyer & T. Yamada. London: Routhledge, 54-70.

Veblen, T. 1998.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Witt, M. A. & G. K. Stahl. 2016. “Foundation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sian Versus Western Executive Responsibility Orientations Toward Key Stakeholde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6(3): 623-638.

Witt, M. A. & G. Redding. 2012. “The Spiri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ior Executive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of the Firm in Society in Germany, Hong Kong,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USA.” *Socio-Economic Review* 10(1): 109-134.

Witt, M. A. 2006. “Introduction.” In *Changing Japanese Capitalism: Societal 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ed. M. A. Wi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9.

Yamada, T. 2000.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the Companyist Compromise.” In *Japa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A Regulationist Interpretation*, eds. R. Boyer & T. Yamada. London: Routhledge, 17-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訪談題綱

說明：爲了讓訪談過程能更流暢，本研究採非正式對話訪談法（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Patton, 2015: 437），訪談前只擬定幾個重要的問題，無固定的提問順序，而且提問時也會隨著訪談情境、受訪者類別、與受訪者所言，而有不同的措辭。

主要訪談的問題如下：

1. 請問您在島上的居住時間、工作性質。
2. 請您簡述您對島上歷史與風土民情的了解，包括島上污染歷史的記憶、環境變化、小島與小島之間的關係、島上居民目前的需求與遇到的問題等等。
3. 您所屬的機構在小島振興上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爲是甚麼？在倍樂生財團前來開發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是什麼？
4. 您所屬的機構，對於財團開發小島的態度爲何？
5. 就您的觀察，財團與島民之間的互動爲何？財團如何回饋島民？
6. 就您的觀察，小島居民對於藝術展覽品的感受爲何？而您本身的感受爲何？
7. 就您的觀察，小島居民對於財團前來開發的感受與態度爲何？這些態度如何具體呈現於行爲中？
8. 就您的觀察，藝術祭（美術館）對小島帶來的影響爲何？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都請描述出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Limitations of Applying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Setouchi Islands*

*Tsuey-ping Lee***

Abstrac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field observation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sm to examine how private corporations applied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to revitalize the Setouchi Islands via contemporary art festival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apitalism, namely strong ties between businesse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ncep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herited from semi-feudalism, affected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the government,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citizens. Adding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mmunities further resulted in a top-down and outside-in revitalization approach when the private corporations intended to address rural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the power of capital.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rivate corporation then created the profit-oriented revitalization model and domina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culture, which led to an increasing divergence between social strata on the islands. At the same time, islanders bore the external cost of tourism without deriving sufficient benefits for the island economy. The Setouchi Islands, which are a so-called example of successful revitalizatio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population loss. To conclude this research, three principles are provided to reduce limitations of applying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

* DOI:10.6166/TJPS.201909_(81).0004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tsueyping.lee@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8 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性：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個案分析 李翠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